

■记忆深处■

奉献爱心 增值人生

上世纪 80 年代，我看到《北京青年报》上关于资助山区失学儿童的号召，在爱人的支持下，我到北京青年宫报了名，办理了相关手续。那时，资助一名儿童得 300 元钱，而我的工资每月也就 100 元左右。就是说，得拿出 3 个月左右的工资资助一名失学儿童。但想到这是关系到儿童一生的大事，我们紧一点儿也过得去，应当尽力帮助。结对子受助的学生叫林峰，是革命老区井冈山地区的。我们经常通信，他向我汇报学习成绩和在学校中的表现，我回信表扬、鼓励他。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，我对他的资助保持了 10 多年。

本世纪初，我刚退休。一

天，我从《老年日报》上看到一篇报道，说的是黑龙江省兄妹俩得了白血病，到北京 307 医院治病，可医疗费远远不够，家里东拼西借，但只够一个人的费用，兄妹俩互相推让，把可能的生存机会让给对方。看了新闻，我非常难受，也深受感动。我把这事和老伴说了，老伴的心情和我一样，她说：“我们应当帮助他们。”第二天一早，我先买了一篮子水果，带到病房看望他们，核实了情况，和兄妹俩又谈了一会儿，鼓励他们以乐观的心态坚定信心，战胜病魔。我将 500 元钱递给他们，他们在表示感谢的同时，要求我留下姓名、单位、电话，以便今后表示感谢。我说：“不必了，希望你们配合

大夫好好治病，在大家的共同支持下，你们一定会渡过难关、恢复健康的。祝你们早日康复！”

2006 年，在《北京青年报》上，我看到了北京青少年基金会捐助中心关于捐助贫困大学生的号召。我和老伴一如既往地，立即报名，每名大学生 4000 元。当时，我每月的退休金是 1000 多元，资助一名大学生仍相当于 3 个月左右的工资。在北京青年宫的希望工程圆梦大学捐赠仪式上，我和受捐学生陈笑笑坐在一起。散会后，她把同来的母亲（父亲已去世）请过来见了面，我们还照了相，以留作纪念。我请她们到饭馆吃了顿饭，又请她们到我家去坐坐。但听说我们

家住在五环外的远郊，得转好几次车，她们便推辞了。陈笑笑考进了首都师范大学，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。我们经常通信。一次，她就如何开展团支部活动征求我的意见，我上学的时候当过团支部宣传委员，就根据自己的经验给了她一些建议。

此外，在遇到地震或大的洪涝灾害时，上级号召捐款，我总是积极响应，尽力而为，觉得为受灾群众献出爱心，心里才平衡。

有一种说法，快乐是分等级的，高级的快乐是灵魂的快乐，那是付出、奉献，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。我觉得这样生活才能增值，才有意义，才不枉活一生。 施宗灿/文

■朝花夕拾■

分救济粮

上世纪 70 年代，生产力水平低，粮食产量上不去，许多村民到了冬春交替之际，往往家中断粮。我家也是这种情况。虽然父母常年操劳，但劳动所得工分有限，分得的粮食严重不足。不得已，父母只好向村领导提出吃救济粮的申请。

1972 年春，一天，我们接到村通知，让赶紧去大队仓库领救济粮。傍晚时分，我和二姐在母亲的带领下，扛着扁担，带着绳子，来到大队的仓库。这时，凡是吃救济粮的村民，已陆续到齐。

大队仓库是 3 间青色瓦房，里面整齐地堆放着装有玉米粒和红薯干的麻袋。我家分到了一麻袋玉米粒和一麻袋红薯干。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我和二姐将救济粮抬到门外。母亲走上前来，用手摸了又摸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在我们即将启程往家走时，母亲嘱咐我们要说一些感谢的话：“感谢政府的关怀与帮助，我们一定不忘党恩，好好听党的话，永远跟党走！”那时，我虽还处在学龄前，却能流畅地说出这番话，博得村领导的赞赏。

天渐渐黑了下來，我和二姐用扁担抬着救济粮往家赶，母亲则在一边照看着。由于我们个子矮、力气小，路上需要不时地休息。来到家门口时，病中的父亲打开街门走了出来，连连嘱咐我们：“小心点，别闪着腰！”大家一起动手，将救济粮抬到院中的西厢房。

许培良/文

■军旅生涯■

1963 年，五一劳动节后，我被抽到某师宣传队，创作一篇短篇评书，参加武汉军区汇演。当时，我创作了评书《新兵李大罗》，经过反复修改，在师里试演后，受到了同志们的称赞和首长的表扬。后来，我把这篇评书寄给《武汉晚报》，很快被《武汉晚报》副刊采用了。

不久，报社给我寄来 20 元稿费。当时战士每月的津贴费是 6 元钱，这 20 元稿费可不是小数目。那时正赶上休

息，我拿着汇款单去邮政所取回稿费。拿着这 20 元稿费，我高兴地往连队跑去。

当我跑到连队门口时，看见几个同志正在说着什么。我走到跟前，只见战士王厚贤正在那儿流泪。仔细一问才知道，他家里来信，说他母亲有病无钱医治，让他请假探亲。

当时部队正在进行紧张的训练，准备迎接团里的大比武。我当即决定把这 20 元稿费给王厚贤家寄去。我二话没

说，从王厚贤手里夺过那封信，就往邮政所跑去。到了邮政所，我拿出钢笔，向工作人员要了一张纸，写了几句话：“妈妈，现在部队训练紧张，准备比武，暂回不去，寄钱 20 元用于看病……”随后，我就把钱和信都寄给王厚贤家。

在回连队的路上，我正好碰到排长郝春喜和王厚贤他们几个人。我把寄钱和写信的事和他们一说，排长和王厚贤都激动地说：“太感谢你了！”

王厚贤还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你帮了我的大忙，我不再向领导请假了，安心在部队好好训练，争取在团里的比武会上取得好成绩。”

后来，连里开会时，连长表扬了我，说我是学习雷锋见行动，帮助战士解决困难的好党员。

现在想来，这 20 元的稿费不算啥事儿，可在那时却起了大作用。

史学敏/文

20 元稿费寄往战友家

■图说往事■

登上恒山主峰

读小学时，我就知道恒山是“五岳”之中的“北岳”，多盛景，多传说。1995 年 6 月 24 日下午，我终于登上了恒山主峰。那年，我 45 岁。

那天，恒山山麓的登山者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。登主峰时，路越来越窄。我踩着硌脚的石径，步步登高，渐渐就气喘吁吁、大汗淋漓了。我和同伴相互招呼着、鼓励着。峰越高，路越险。临近主峰，必经之处



是悬崖峭壁。我小心翼翼地手脚并用，终于攀了上去。攀过险崖，离主峰还有三四百米。虽然腿有些酸，有些气喘，但我仍坚持一步不停地登上

去，终于看到了“恒山主峰”的石碑，上面写着：“海拔 2017 米。”站在恒山主峰上极目远眺，顿觉心旷神怡，非常愉快。

杨福久/文并供图

图为本文作者（左）和两名登山者在恒山主峰上的合影。

■似水流年■

当了一次群众演员

1973 年夏天，长春电影制片厂在邯郸涉县山区拍摄电影《艳阳天》。有一天，我有幸当了一次群众演员。

那时，父亲在涉县一家企业工作。一天，我从邯郸去涉县看望父亲。在父亲的工厂里，一位工人师傅对我说：“县城以北的井店公社王金庄正在拍摄电影《艳阳天》，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里演李向阳的演员郭振清也来了，我们一起去看看？”一听说那里在拍电影，我便来了兴趣，跟随那位师傅来到拍摄地点。我们看到扮演萧长春的演员长得身材魁梧，浓眉大眼，是个陌生面孔，后来才知道他叫张连文。这一天，其他的演员我都看到了，唯独没看到郭振清。一连几天，我都到拍摄地，只是想看一看“李向阳”的

尊容。导演林农个子不高，人也不胖，但说话嗓音洪亮。有一次，他把我们围观的几十个人叫到一起，让我们扮演群众演员。我们按照他说的去做，集体往村里走，一直走到村里一农户的家门口。虽说这几次都没有见到郭振清，我感到有些沮丧，但当了一次群众演员，心里美滋滋的。

时隔不久，电影《艳阳天》上映了。一天，我和几位同事去看电影，当看到电影里许多熟悉的面孔时，我激动不已。我紧盯着每一个镜头，看到村外广场上的群众往村里走去时，我兴奋地说：“瞧，那个穿白衬衣的就是我，可惜只拍了个背影。”

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当群众演员。 梁玉锁/文

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